日本帝国主义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的两手政策

丁　则　勤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发动了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全面侵华战争。独占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它妄图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全部侵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采用速战速决的战略进攻方针。"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①，企图不费大力实现速决亡华计划。"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改变这个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②

本文试图以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为指导，就日本帝国主义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两手政策问题作一初步探讨。特别是着重对此一时期当中，日寇的政治诱降政策如何配合其军事打击政策而施展的问题，蒋介石政府如何适应日寇的两手政策从事大量卖国投降活动的问题，以及在此一时期的末尾，日寇如何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变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问题等，进行一些极粗浅的研究。

一、"不扩大方针"烟幕和武力侵占平津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武力灭亡中国，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既定国策。"九一八"事变是实现其既定国策的重大侵略步骤。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③在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步步进逼，于一九三五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

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日本广田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了所谓《国策基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总体性侵略扩张方案，其中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是："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④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早期设计。必须指出，在这个总体性侵略方案中，日本政府正式确定以所谓"外交和国防"两手互相配合，作为推行其国策的基本手段。

为了实行这套侵略扩张的总政策，日寇首先加快了对我国华北的侵略。在《国策基准》制定后的第五天，广田内阁制定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纲要》中提出了所谓"华北分治"的具体步骤。其中规定"分治的地区最终以华北五省为目标。""首先全力以赴地进行冀察两省明朗化工作（即经济的开发和民心的安定）和分治的完成"。⑤日本侵略者的企图是制造一个脱离中国，完全服从日本意志的华北五省政府。"在预期的华北五省独立宣言发表后，就对它进

行军事占领。”⑥

为武力侵占我国平津华北，日寇擅自在华北增兵。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把其“中国驻屯军”兵力增加约两倍，从原来的“交代制”改为“永驻制”。兵力从原来的两个步兵大队激增为由两个步兵联队以及炮兵联队、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组成的战略单位。驻屯军司令部设天津，步兵旅团司令部则设在北平。对所谓“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规格也升了级，象对关东军司令官一样，由日本天皇亲自任命中将级以上高级将领充任，称为“亲补职”⑦。增兵后，日本侵略军在平津地区频繁调动、“演习”，制造挑衅事件，为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国发生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和卓有成效的努力，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创造了条件。

西安事变后，中国正处于从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到实现抗战的过渡期中。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破坏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掩盖即将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故意装出“缓和”姿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一九三七年三月，日寇两次唆使伪内蒙自治政府通电“拥护”南京国民党政府。林铣十郎内阁的外交大臣佐藤尚武自一九三七年三月上台以后，更出面拉拢蒋介石，诡称日本要改变过去对中国的关系，协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从而乃有儿玉谦次经济考察团访华。儿玉谦次为日本著名财阀，日华贸易协会会长，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率考察团抵沪。派遣儿玉访华，名义上标榜所谓“中日经济提携”，诡称协助中国“完成现代国家之组织”。实际上，考察团之派遣，是由日本外交大臣佐藤、陆军大臣寺内所策划和怂恿，为日本陆海军军部所操纵，真实目的在于替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掠夺中国资源，并以经济界人士面目出现，为因西安事变而暂时中断了的日蒋谈判牵线。儿玉来华以后，受到蒋介石政府给予的“意想不到的欢迎”。⑧三月十六日，儿玉见蒋介石。蒋介石在欢迎会上说“礼义”为“东方文化的特点”，希望两国“为东方文化来努力。”⑨一时之中，日蒋之间“缓和”声浪甚嚣尘上。

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及时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一九三七年五月，毛泽东同志指出：“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⑩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⑪

实际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之所预料。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日本统治集团更加紧了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为了使制造借口和发动战争更加有把握，日寇在平津地区继续增加兵力。芦沟桥事变前夜，日寇“中国驻屯军”从一九三六年五月的六千人增加到七千人。⑫

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上台组织内阁。六月底和七月初，裕仁天皇频繁召见元老、重臣。据六月三十日的木户日记所载，天皇曾亲自向汤浅内大臣提出：“看来华北的中央化结局在于时间的问题是必然的，若果然是这样，宁可先动手而容纳中国的希望如何”⑬，接着，又提出要不要召开御前会议来决定华北对策方针的问题。对此，内大臣奏称：“召开御前会议也难期待有充分的效果，重要的是只要有统帅的确信，就没有妨碍”。随后，对于御前会议的问题，元老西园寺公望也表示了同内大臣“全然同一”的想法。⑭这期间，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所谓“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正在流传着七日深夜“会在华北重演柳条沟事件”

的消息。⑮果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日寇“中国驻屯军”就在未通知中国当地驻军的情况下在芦沟桥附近实弹“演习”，故意向中国驻军挑衅，以仿佛听到宛平城内发枪数响和一名士兵行踪不明为借口，于八日黎明前，向芦沟桥附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我芦沟桥和宛平县城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所属部队奋起抵抗。是为七七芦沟桥事变。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⑯

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作战部署。七七事变第二天，日本政府在《陆军中央部对处方针》中决定“派遣充分的兵力，期迅速的解决”，并且决定东京以西原定七月九日复员的陆军各师团复员展期。⑰七月九日上午，陆军大臣杉山元在临时阁议上提出派遣日本内地三个师团和其他师团的动议。⑱十日夜，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又内定派遣关东军两个旅团、朝鲜军一个师团、日本内地三个师团为基干的步兵、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计划。⑲十一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和五相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关于派兵华北的声明》。⑳当天傍晚，日本首相近卫到叶山“御用邸”向天皇“上奏”。天皇立即裁决，“声明”遂于当晚正式播发。㉑

这个“声明”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逻辑宣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㉒

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夜以继日地策划对中国本部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一面又紧密配合军事进攻开展政治欺骗。在《关于派兵华北的声明》中，日本政府宣称：“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㉓这就是日寇鼓吹的所谓“不扩大方针”。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深刻揭穿了日本侵略者的政治阴谋。洛川会议决议明确指出：“芦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㉔

历史事实证明，日寇正是利用所谓“不扩大方针”的烟幕，双管齐下，对平津地方当局和南京蒋介石政府进行谈判以掩护对平津华北的军事进攻。

首先应该揭示的是，日本侵略者同二十九军当局的三次“停战”谈判，边谈边增兵边进攻。

日寇对芦沟桥的进攻，遭到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寇就以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局部解决”作掩护，同二十九军当局进行了多次谈判。其中，主要的谈判有三次。

第一次“停战”谈判在七月九日“达成”，条件三条：（一）双方同时停止射击；（二）天明时日军撤到芦沟桥迤西；（三）宛平城内防务由二十九军交冀北保安司令部石友三部保安队接防，人数限为二百名至三百名，定九日上午九时接防。㉕通过这次谈判，日寇达到暂时调开曾在芦沟桥抗日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改由亲日的石友三保安队接防之目的。可是，日寇并不遵约撤兵，而是继续向宛平轰击。接着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开来，在芦沟桥至宛平城之间布成防线，对宛平中国军队构成包围之势。㉖

七月九日下午，谈判重开，日寇“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阴险狡猾的桥本群和驻中国使馆

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同二十九军副军长、亲日分子秦德纯进行交涉。桥本群把日寇参谋本部制定的《华北时局处理要纲》中所提四项条件向冀察当局提出。四项条件是：（一）中国军队不得在芦沟桥附近和永定河左岸驻屯；（二）关于未来的必要保证；（三）处罚直接负责人；（四）谢罪。[27] 二十九军当局终于屈服于日寇压力，于十一日晚八点，由秦德纯出面，与日寇签订了所谓第二次"停战"协定。然而，就在这个协定签字的几乎同时，日本政府却正在向全世界播发天皇亲自裁决的《关于派兵华北的声明》。同一天，日寇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以及朝鲜军第二十师团都开始出动向我平津地区进犯。[28]

增援后，日寇气焰更加嚣张，新任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七月十四日纠集了在平津地区的日本陆海军官佐开会，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乘飞机赶来参加，共同策划对平、津、华北的侵略。[29] 接着，香月亲自出面，利用宋哲元等人醉心于保存实力、地盘以及对日寇"局部解决"的幻想，再次向冀察当局提出"停战"条款七条。内容为：（一）镇压共产党；（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走排日机关；（四）撤去兰衣社、ＣＣ团；（五）取缔排日言论；（六）取缔排日教育；（七）撤去北平城内的军队。[30] 以上所谓"条件"，实际是要求冀察当局向日寇完全纳降，自动让出平津地区。在日寇压力下，十七日，张自忠[31]代表宋哲元承认了七项条件的大部分。十八日，宋哲元以"祝贺新司令官"的名义，往访香月清司于天津，并向日寇表示道歉。十九日，由张自忠、桥本群在"停战协定"细目上签字。[32]

就在七月十九日达成所谓"停战协议"的当夜，日军集中火力向宛平县进攻，房屋多被炸毁，居民死伤很多。[33] 数次攻击宛平县城之后，二十日，日军复以步、骑、炮兵及坦克向宛平攻击，两次猛攻，都被守城军民击退。

既无决心抗战，又谋求对日妥协不成，徬徨犹豫中的宋哲元不得不召集高级将领开会。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和推动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等人主张采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攻为守"的方针；张自忠、刘汝明等人则主张采用南京政府提出的"以退为守"的方针。两种意见、相持不决。宋哲元呆若木鸡，不做一声，最后，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一划，说：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我们就"以守为守"吧！[34]

在蒋介石政府和二十九军当局的错误政策下，日本侵略军利用谈判间隙迅速在平津地区展开。日寇关东军两个旅团从古北口越过长城线。其中，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于七月十七日到达北平东北约三十公里的顺义附近地区；第十一旅团于十九日到达北平东北约25公里的高丽营一带。日寇朝鲜军第二十师团主力在十八日开到天津附近；另一部则集结于山海关和唐山一带。日寇空军临时航空兵团的十七个中队也在沈阳和锦州待机，准备对北平、天津进行总攻击。[35]

日寇一面以两手政策同二十九军当局进行所谓"现地解决"的交涉，掩盖其对平津的进攻；一面还对蒋介石政府进行恫吓，意在使国民党政府不敢坚决抗日，甚而帮助日寇迫使二十九军让出平津地区。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驻华大使川越茂故意离开南京去青岛和天津，避开国民党政府可能提出的交涉，以示对蒋介石政府的藐视与强硬态度，并在华北与日酋香月等辈共谋策划对平津的侵略。七月十日，日寇驻中国使馆武官得到了一个国民党政府开始派中央军北上的夸大了的情报，[36] 日本政府遂又立即命令驻中国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去国民党政府进行威胁和

试探摸底。

七月十一日，日高往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诡称："日本政府的意图是想从速现地解决"，对蒋介石政府进行诱惑，并试探国民党政府关于派遣中央军北上的消息是否确实。据日高战后在东京裁判法庭上的证词供称，当时王宠惠未否认有派中央军北上的事。[37]

针对这个情况，日本外务省火速拟了一个同蒋介石政府交涉的方案，交五相会议通过，并且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天（七月十七日），电令日高信六郎面交王宠惠。[38] 这是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照会内容要求蒋介石政府以七月十九日为限期，履行宋哲元对日本道歉，罢免冯治安（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二十九军撤到八宝山附近，宋哲元重新在十一日的"停战"条件上签字等项；并威胁说，中国方面如不按期履行日本方面要求，日本就中断现地交涉，动员日本内地军队到华北。同时，还提出要求国民党政府撤回北上的中央军，不要妨害日本所谓"现地解决。"[39] 到十九日这一天，蒋介石政府外交部居然按照日寇规定的期限答复日高，实际上接受了日寇和平津地方当局议定所谓"和平解决"办法的骗局。但是，日本政府仍不能满意，以为答复不够具体，还不能最后摸透蒋介石是否打算放弃平津。于是，日高转而通过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亲日分子）高宗武去直接向蒋介石摸底。高宗武的答复是，蒋介石本人强烈地希望事件迅速解决。日高抓住这个线索又同亲日派、四川省主席张群会谈摸底。到七月二十五日，双方会谈了两三次。张群说明，蒋介石同意七月十一日的现地协定，但要求：首先日本要声明撤兵，然后中央军南下，再然后日本撤兵（实即只要求日寇口头"声明"撤兵，蒋介石即可单方面撤兵）。一直到战后，在东京裁判法庭上，日高还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当他摸到蒋介石这个卖国态度时所感到的高兴。[40] 原来，在当时，很可能由于日高摸准了蒋介石实际准备放弃平津的卖国态度，刚一从南京回到东京，八月二十四日，竟能以中级外交官身份得到奉赐拜谒天皇的破格荣宠。受宠若惊的日高，一出来碰到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时，情不自禁地夸耀说："从陛下领赐了非常难得的话啊"。[41]

七月二十五日，日高信六郎摸到了蒋介石卖国态度的底，二十六日，香月清司就指挥日军进攻廊房和北平广安门。二十七日，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皇族、明治天皇之弟）奉裕仁天皇"敕命"，下令增派日本内地的第五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师团到华北，并下令攻击北平天津的中国军队，武力占领平津地区。[42]

二、所谓"船津工作"和"陶德曼工作"与日寇进攻上海南京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速战速决三月亡华的梦想，在武力侵占平津期间，就已经在紧张地策划着对上海南京的进攻。

早在七月十一日，日本政府在一份《关于华北作战陆海军协定》[43] 中，即已经决定在青岛和上海作战。紧接着，日寇海军第三舰队集结上海。七月十四日，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向日本政府报告说："海军对进行全面对中国作战，已处于准备完备状态。"七月十六日，长谷川清又提出报告，主张迅速用武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并要求日本政府派遣五个师团陆军用于占领上海南京。[44]

在大举进攻上海的前夜，为了掩护备战和进攻，日本侵略者又一次施展了政治诱降惯伎。先由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和海军拟出一个所谓《全面调整日华国交案要纲》，经内阁书记官长和陆、海、外三省主官协议，八月四日在四相会议中通过。其内容要点为：

(一)事实上承认"满洲国";(二)缔结中日防共协定;(三)停止排日;(四)停止冀东特殊贸易,停止自由飞行;(五)降低特定品的关税率等。[45]

次日,日本陆、海、外三相又决定了一个所谓《日华停战条件》,要点为:(一)在宝昌、张北、龙门、延庆、门头沟一线以东以北地区及河北省内永定河、海河左岸(包括长辛店附近高地和天津周边)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二)取消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三)取消冀察、冀东两政府并由国民政府"任意"行政,但希由体现日中融和之适当有力人物充当行政首脑;(四)撤退增派的日本军队。[46]

显然,以上两个方案只不过是日本进攻上海之前故意施放的"和平"烟幕。日寇既已武力侵占我国平津地区,并在华北扩大侵略,在占领地实行殖民统治和掠夺,一九三三年以来至七七事变以前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冀察"、"冀东"两政权以及什么冀东特殊贸易等项,对日寇早就不够用了,乐得宣布"取消"。日寇旨在灭亡整个中国。任何诱和条件,只要尚未完全达到这一根本国策的要求,日寇是从来不准备就此停战的。

日本帝国主义清楚地知道,上海是蒋介石赖以起家上台的江浙财阀、青红帮流氓帮会头目的汇聚之地。所以,在进攻上海之际日寇极力谋求在上海寻找这些财阀和帮会头目进行活动,以便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政府的政策。因而,在派谁充当诱降谈判代表的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煞费了一番苦心。当时,日本外交当局除命驻中国大使川越茂出面从事这类活动外,还打算另外再派一些人。为此,日本首相近卫等人曾反复进行了磋商,考虑过要派川崎造船社社长松方幸次郎,还想到过头山满(日本法西斯团体黑龙会的头子)。最后,终于确定了一个叫做船津辰一郎的人。[47]此人曾任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的理事长,又当过驻沈阳和上海的总领事,同国民党政界、财界以及帮会都有广泛联系。

船津于八月四日到上海,七日,从电报中收到前述两个诱降方案,当天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以及刚从青岛回上海的川越茂进行了密商。八月九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逐臭而来,密晤船津,当晚同川越也进行了密谈。在同船津的密谈当中,高宗武毫不掩饰其民族失败主义的媚日情绪,恬不知耻地对船津说:"说到自己,完全是孤城落日观"。[48]高宗武的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盛行的亡国论腔调。在同船津川越密谈之后,高宗武匆匆赶回南京。就在九日当晚,日寇即制造了发动侵略上海借口的挑衅事件。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二人驾军用汽车向我虹桥军用机场飞驰,企图侦察中国军队配备情况并冲入机场寻衅,机场中国卫兵鸣枪警戒,日寇二人毙命。日本侵略者乃以此为口实,于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是为"八一三"上海事变。

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我国广大革命人民以至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都奋起抗战。但是,在上海的资产阶级上层某些分子和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官僚政客,既害怕战争对他们财产的破坏,又害怕民众的起来,却在纷纷同日寇暗中勾搭。船津辰一郎等人在上海资本家上层某些人物以及官僚政客当中的活动,正是利用了他们这种通敌投降倾向。这时,船津同与戴笠系特务机构暗中勾结的流氓帮会头子兼财阀的杜月笙、著名财阀钱永铭(交通银行总经理)等数人正在协议一项所谓"解决时局"的方案。只是由于日寇进攻上海的战火迅速扩大,此项阴谋活动才告中断。[49]

在进攻上海期间,日寇的诱降活动是非常猖獗的。据我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当

时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利用一些老牌的汉奸在上海到处活动，散布'和平'空气，勾引政府内部的一些亲日分子。曹汝霖，王克敏，陈觉生，李思浩，梁鸿志，吴光新，这一批汉奸现在均云集上海沧州饭店，哈同花园，忙个不休。而政府内的某些亲日派官吏，亦秘密往来于上海，与这些汉奸接洽谈判。据可靠消息，李思浩在沪活动，曾与翁文灏有所接洽，吴鼎昌在沪，曾与一日本外交员秘密谈判。王晓籁曾与日纱业界某人接洽和解中日战争，王克敏陈觉生及一日外交员曾与中国财政界某要人在沪与银行界会晤酝酿和平运动"。[50]

《解放》周刊时评指出："日本的新阴谋，大批汉奸的活动，这是目前的严重危险。必须无情的揭露日本的新阴谋，反对汉奸的'和平'运动。"[51] 时评还强烈主张："如果南京政府的官吏与这批汉奸还保持往来接洽秘谈，应当视作是通敌的份子一样看待。"[52]

由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掀起的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强大压力，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严重打击了英美法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严重威胁了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和统治，国民党统治集团才被迫正式接受了我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七年九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和大力推动下，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众抗日运动迅速广泛兴起。参加上海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在民众抗日爱国热潮推动下，也发挥了一定的战斗力。

上海抗战虽然支持了近三个月，但国民党政府害怕民众甚于害怕日寇。他们拒绝接受我党全面抗战的正确主张，一味采取单纯防御的错误方针，被动应战。对在前线苦战的国民党士兵更是漠不关心，只顾抢运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集中在上海的巨大财富，前线士兵常常几天吃不上饭，慰劳品又经常被官吏贪污、特务扣留，伤者没人抬，战死没人埋，弹药物资补给或者没有，或者有了也运不上去，这些都极大地挫伤了前线军民的锐气。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了"八一三"上海事变以后不久，为了加紧扩大全面侵华战争，一举灭亡中国，决心公开撕掉所谓"不扩大方针"的假面具。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上午十时，日本政府制定了《抛弃不扩大方针的阁议决定》。这份阁议决定内称："抛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对策"。并决定"为了适应事态扩大的经费支出，在九月三日前后召集临时议会。"[53] 九月四日，日本天皇向第七十二届临时帝国议会开幕式发布"敕语"说："今朕之军人，排除百难致其忠勇，是不外一促中华民国之反省，从速确立东亚之和平。""朕望帝国臣民鉴于今日之时局，忠诚奉公，和协一心，以赞襄达成所期之目的。朕命国务大臣向帝国议会提出特关时局紧急追加预算案及法律案。卿等克体朕意，努竭和衷协赞之任"[54]。在日本天皇亲自敕命下，在这次临时议会上通过了追加二十亿日元巨额临时军费的决定，相当于日本政府当年全部岁出预算总额二十七亿日元的百分之七十五。[55] 然而在上海正面作战的日本侵略军由于遭到中国军民英勇抵抗，却陷于不利地位。指挥笨拙的日本统帅部经过很长时间才制定出从上海侧背登陆的作战计划。十一月五日，日寇第十军（三个半师团）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十一月十三日，从华北调来的第十六师团在白茆口登陆。[56] 从事消极阵地防御的国民党军队恐被切断后路，于十一月十一日开始撤出上海。

日本侵略者把占领中国国民党政府首都看作实现亡华国策的重要步骤。当上海战争还处于胶着状态时，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日本政府通过了一个所谓《处理中国事变要纲》。[57] 在这份文件当中，日本法西斯政府明白招供它的方针"本意在于以军事行动之成果和外交措施之机宜两相配合，使这次事变尽快结束，使中国放弃抗日政策和容共政策，在日华间建立真

正明朗而且永久的邦交，以期实现日'满'华的融和与共荣"。这清楚地再次表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是为达到灭亡中国目的的两种手段。当他们感到军事进攻一手难于达到目的时，就玩弄诱降一手，诱降阴谋不能满足侵略野心时，就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为此，《要纲》规定"军事行动以迅速使中国抛弃战斗意志为目标"。紧接着，日寇设置了华中方面军，由正在打上海的日本军阀松井石根充当司令官。日寇占领上海的前五天，日本参谋本部就下达命令要求松井在打下上海之后立即推进到苏州至嘉兴之线。[58] 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命令松井推进到无锡芜湖一线。[59] 当时，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以及松井石根的司令部里，都漾漫着打下南京就意味着灭亡了中国的空气。[60]

在政治外交方面，《要纲》规定："外交措施的目标在于迅速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对于中国与第三国，进行及时地谈判与工作，在结束事变方面，使中国取消抗日政策与容共政策，不拘泥于过去的情况．为调整邦交而进行划时代的外交谈判。"在该《要纲》通过的同时，十月一日，近卫和广田等人还制定了诱降方案的细目。在上述情况的背景下，日寇再次放出和平空气。

于此必须指出，当时，美英帝国主义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是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他们与日本在远东的矛盾逐步加深。但是出于其帝国主义利益的考虑，却仍继续其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推行的对日绥靖政策，幻想日本进攻中国能够"适可而止"，图谋牺牲中国对日妥协，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既得权益。此种情况虽然尚未发展到中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英美分别与日本策划的远东慕尼黑阴谋阶段，但带有类似性质的阴谋活动却在一再酝酿中，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战略进攻阶段用于推行两手政策的工具。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内容相当复杂，因非本文主要论题，故不拟多予赘述，日后当于另文中进行讨论，在本文中，只能在极有限的程度上涉及。

芦沟桥事变爆发以来，美英都曾表示打算"调停"中日战争，均为日本所拒绝。日本基于同美英的矛盾，不愿美英插手中日战争。但鉴于蒋介石政府已向英法操纵的国联提出控诉，为牵制国联，日本外交大臣广田在十月一日的《要纲》即将通过前夕，曾同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商谈日后由英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可能性问题。[61] 广田告诉克莱琪，日本政府愿意在四项条件的基础上派代表去中国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日寇提出的四项条件是：(一) 在华北建立非武装区；(二)保持与"满洲国"事实上的关系；(三)控制在中国的排日运动；(四)承认在华北经济机会均等的原则。[62] 据说，当英国大使把广田的条件递交给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除对设立一个新的非武装区表示"很不赞成"之外，对其余条款都没有提出异议。[63]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咨询委员会的两个报告书。这两个报告，既反映了英法同日本的矛盾，又反映了英法对日妥协倾向。报告书认为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并非出于自卫，与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相抵触；但却不直接指斥日本为侵略者，而且拒绝了蒋介石政府代表提出的由国联决议制裁日本的要求。报告书只不过提出了一项邀请九国公约签约国以及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开会讨论"调停"中日战争的建议。在国联报告书通过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隔离演说"[64]，这反映了美日矛盾的加深，并给人们以国联报告书是在美国总统演说之后才得以通过的印象，为美国夺取了西方国际舆论的领先地位。罗斯福的芝加哥演说发表后，日本统治集团曾一度相当紧张，西方政界也咸以为美国将带头采取措施严厉制裁日本。然而，在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一阵攻击之

后，罗斯福迅速从芝加哥演说的立场向后退缩。美英两国都极力避免同日本处于公开尖锐对立的地位，几经折冲之后，根据罗斯福的建议，定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赛尔召开九国公约签约国会议。[65]日本法西斯政府拒绝参加布鲁赛尔会议，并于十月二十一日由外交大臣广田向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示意，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希望德国劝说国民党政府接受由德国斡旋的中日直接谈判。[66]日寇这时通过其法西斯盟国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直接谈判，正是根据其十月一日《要纲》的指导思想，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侵占上海、进攻南京以及扩大侵略华北的军事压力，最大限度地利用蒋介石政府的亡国论情绪，逼蒋订立城下之盟，实现速决亡华梦想。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对布鲁赛尔会议进行抵制。

针对日寇放出和平空气的目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骤后，它将为着三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幕弹。这三个目的是：(一) 巩固已得的阵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二)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三)拆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阵线。现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开始而已。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67]毛泽东同志的谈话不仅深深戳穿了日寇施放和平空气的罪恶目的，而且也是对蒋介石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各国的严正警告。

布鲁赛尔会议定于十一月三日开始。日本外交大臣广田特地选择布鲁赛尔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即十一月二日，正式向德国驻日本大使提出了对蒋介石政府的诱降条件。广田提出的诱降条件是："(一)内蒙古建立自治政府。(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为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以南一带。假如和约立即缔结，则华北的全部行政权交给南京政府，但要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假如现在不能缔结和约，日本就要在华北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其机能将继续到和约缔结以后。正在谈判中的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区，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防共。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如无秘密条款，则与本项并不抵触。(六)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七)尊重外侨权利。"[68]

摆出这个诱降价格之后，广田希望德国帮助日本向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继续抗日，日本就要"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为苛刻的条件。"[69]

德国乐于帮助日寇对蒋诱降，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日本进攻中国而把全部力量牵制住了，因此与俄国的力量相比，日本将日益削弱。"[70]不利于日后配合德国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其次，德国认为自己在中日两国"都有很大的经济利益"[71]，担心日本侵华战争延长会使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受损。

十一月五日，希特勒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把日本的诱降条件秘密转交给蒋介石。当时孔祥熙也在坐。蒋介石一面摆出"恢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状态"的妥协投降价格，一面向陶德曼表示："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72]蒋介石对法西斯侵略者上述摇尾乞怜的表白，不仅说明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卖国本质，而且也从反面证明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流砥柱的地位和作用，说明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怒

潮的强大力量。就连蒋介石在与日寇暗中搞妥协谋和活动时也不能不考虑到一旦公开投降日寇，必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浪潮席卷以去。从而，蒋介石与陶德曼约定双方都要“严守秘密。”在此次与陶德曼的密谈中，作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蒋介石，强烈显露出希望美英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的幻想。蒋介石向陶德曼表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赛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73]

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抗战，但是一再屈服于日寇的军事压力，出于其反动的阶级本性，幻想通过美英调停，达成对日妥协。他们以为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停止日本的进攻，就能维持西方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以及四大家族的财产和统治，并且还想从抗日战场上腾出手来打击中国共产党。所以，在布鲁赛尔会议开场的当天，蒋介石迫不及待地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所谓对日“和平”方案。此项对日妥协求和方案的要点有：(一)中国寻求在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原则基础上的解决(按：即谋求在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地区内保持半殖民地状态)。(二)关于细目的建议(1)建议日军适当撤退到七月七日以前的人数和位置，并撤除(对中国海岸的)封锁，从停战之日起，九个月内，中国军队不进入(日军)撤出的地区(按：此点同十一月五日蒋介石同陶德曼所谈基本相同，即，只要求恢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不提完全驱逐日寇出中国)。(2)继续七月七日以前商定的中国与“满洲国”的关系，暂不谈对“满洲国”的承认问题。同意在沿辽宁热河至河北察哈尔之间设立一个宽十公里的非武装地带。(3)接受在南京中央政府支配之下建立的华北当局，取消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在日本压力下成立的一切非法政权，日军限驻于辛丑和约规定的地点，人数与其他国家相匹。(4)关于上海。中国军队不进入一九三二年(淞沪停战)协定包括的(非武装)区域，亦不在其中构筑工事；日本把军队减少到租界防军的适当比例。(5)中日经济合作。与其他外国企业相较，中国保证不歧视反对任何日本经济企业，并准备与日本谈判一项通商条约。在公平对待日本以外的中外利益及互利的基础上，对日本友好谅解，同日本修订关税；鼓励华北的棉植业；邀请日本专家任农、工业技术顾问；在合办及互利基础上中、日、“满”通航；在真正尊重中国主权的友好态度下，承认日本所需的矿业；在技术和财政条件有利情况下，从日本购买铁路器材。中国保证大量和定期供给长芦盐。(按：在“公平”、“互利”和“尊重中国主权”等表面词句掩盖下，大量向日寇出卖国家权益)。(三)关于共产主义。中国希望日俄缔结类似中俄之间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国内的共产主义是中国内政问题（按：言外之意是说，蒋介石将于对日妥协“停战”之后自行反共，形式上不要求日本插手)。(四）文化关系。建议成立一个中日共同委员会以利用对日本的庚子赔款(按：即与日寇互相配合，把搜刮来的中国人民血汗用于推行日寇对华奴化教育和文化宣传)。(五）由中日两国和中立国参加的混合委员会商讨(对日本的）赔款办法。[74] 这份收藏于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蒋帮对日妥协谋和方案，是蒋介石集团抗日战争初期的重要卖国罪证。此件直至一九五四年始为美国政府所公布。

在布鲁赛尔会议上，美英法各国代表各作了长篇空洞的发言，侈谈遵守国际法及“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之必要，然而对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制裁日寇侵略，则皆讳莫如深。布会在十一月十五日实即草草结束，最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通过一个报告书遂宣告休会。会议对日本侵略中国未采取任何制裁措施，甚至连字面上的谴责都很模糊。布鲁赛尔会议上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对日绥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蒋介石集团的对日妥协倾向。

在上述背景下，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趁机多管齐下对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

在南京，十一月九日，德国驻蒋帮军事顾问福根霍逊在陶德曼指使下出面向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白崇禧等人从军事、经济与革命三个角度大加恫吓，要他们注意“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75]

在东京，日本政府通过美国对蒋介石一打一拉。在布鲁赛尔会议实际结束的十一月十五日当天，广田召见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要求美国转告蒋介石，“战争再继续的时候，条件就更苛刻了”；“中国如果接受（按：指日本诱降条款——笔者），日本可以把代表公开地或秘密地派到上海。”[76]

在柏林，十二月一日，德国外长牛拉特也向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施加压力称：“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就越大。”[77]

同一天，日寇参谋总长奉日本天皇“敕命”，以大本营陆军省名义正式向日酋松井石根发出进攻南京的命令称：“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和海军协同对敌国首都南京攻略之”。[78]

在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外交两手政策压力下，在美英帝国主义绥靖政策影响下，蒋介石于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时纠集在南京的高级将领开会，讨论日寇诱降条件。到会人一致认为日本条件“可以接受”。蒋介石也无耻地端出了自己的卖国态度，说“（一）德意志之调停，决非应予拒绝者，盖此非亡国之条件；（二）华北政权需要保持。”[79]

一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召见陶德曼，宣布对日寇妥协投降价格称：“（一）愿接受日本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二）同意派亲日分子任华北行政首领；（三）同意共同防共；（四）恳求德国做中介人斡旋到底。”[80]

这说明，蒋介石只要在东南沿海保存四大家族的财产和统治，在华北保存一定的形式，实际归日寇统治，就准备对敌妥协言和，至于东北，于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时就已经默认日寇占领，此时早就不在话下了。

然而事态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之所预料。毛泽东同志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寇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81] 事实证明，蒋介石的求和条件，并不能满足日寇灭亡全中国的欲壑。

日本侵略者一面通过陶德曼对蒋介石诱降，一面大举进犯南京。上海沦陷后，蒋介石曾声言要死守南京六个月，但在日寇发起攻击之后，短短六天即弃城而逃。国民党政府于十一月二十日宣布迁都重庆，政府机关实际迁到武汉。从日军占领南京城门为始，裕仁天皇每天亲自听“战况”奏报。十二月十三日日军攻陷南京。十四日下午一时，天皇对侵略军官兵“传旨嘉奖”说；“华中方面之陆海军诸部队，连续在附近作战，勇猛果敢进行追击，速陷首都南京，深思满足”。[82] 天皇并于正午召见陆海军主要军阀和首相近卫以下内阁显官至丰明殿“赐宴”以兹“庆贺”。据说，欣喜若狂的军阀、阁僚们在席间纷上祝词，天皇“龙颜殊丽”。[83] 接着，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裕仁天皇又向日本第七十三次帝国议会开幕式发布“诏敕”，宣称“朕之将兵每战奏捷，著大勇武于中外”，并且亲自命令国务大臣在帝国议会上提出一九三八年度的预算以及临时军事预算。[84] 在天皇亲自“敕命”下，一九三八年日本临时军费支出额相当于一九三七年的二点四倍，高达四十七亿九千五百万日元，为日本一般会计岁出额的约一点五倍。[85]

正当日本统治集团如醉如狂地“庆祝”攻陷南京并策划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之际，松井石根指挥的日本兽军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军民被害者约达三十万人，市内三分之一房屋被焚毁，抢掠奸淫的浪潮遍及南京内外。日本法西斯强盗妄图用野蛮的屠杀政策显示其“胜利”，以为可以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信心。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日本统治集团在攻破南京之际，继续玩弄两手阴谋，在蒋介石十二月二日基本接受了的诱降条件上加码。

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内阁决定在前述的诱降条件外，增加以下四项：“（一）中国政府须放弃联共、反日、反‘满’政策，与日‘满’共同反共；（二）在中国必要区域设立非军事区及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缔结密切之经济合作协定；（四）中国偿付日本要求的赔款”。[86]

一心急于对日妥协求和的蒋介石集团这时急急忙忙向美国主子请示办法，乞求援助。为此，孔祥熙派驻美大使王正廷去“征求美国政府对于接受日本条件与否的意见，并要求罗斯福调停”。[87] 狡猾的美帝国主义为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自然不愿日本完全灭亡中国，然而又要坐视中日两国两败俱伤，以便美国最后出来收拾残局。[88] 所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王正廷微妙地表示：“要他的回答能使蒋介石满意是很困难的”[89]；给了蒋介石一个橡皮钉子。这件事很快就被日本外务省知道了。

卖国成性的蒋介石还不死心，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又派王宠惠去请求德国转达日本政府，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加以仔细研究，作出确切的决定。”[90] 不愿中断对日秘密谋和这根线。

但是，以诱降手段掩护扩大侵华战争的日寇等不到蒋介石集团再去做什么“研究”和“确切的决定”，决心继续使用军事进攻和扶植占领地傀儡政权的办法实现使中国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野心。一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召开联络会议，接着，又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91] 声明中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真正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当晚，日本首相近卫向天皇报告了当天会议的经过，请求天皇对发表政府声明作出裁决。在裕仁天皇亲自批准下，十六日，近卫正式发表了这份政府声明。[92] 这是近卫内阁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声明。

从发动芦沟桥事变到武力侵占南京，完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战略进攻的初期阶段。此后，日寇亡华野心虽然不变，但速决幻梦渐趋破灭。

抗战开始以来，日寇辅之以诱降政策的长驱直进，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和对日妥协谋和倾向，使许多爱国志士对时局深感忧虑。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曾就日寇进攻华北和上海南京以来的时局问题，从日本、中国与国际三个方面，分析了妥协危机和妥协难于成功的原因。毛泽东同志说：“还在抗战初起时，我们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93] 毛泽东同志作出的科学结论是：“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

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94]

三、所谓“宇垣外交”和日寇进攻广州武汉

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近卫声明，既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威逼政策，又是对它的诱降政策。

近卫声明发表前五天，在一月十一日下午天皇临席的御前会议上曾决定了一个《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露骨地表明了两手阴谋。此件决定之后，立即由陆军省军务课以总理大臣和参谋总长名义，用“至急、亲展、极密、暗号”专电通知日寇各侵略军头目。电文中称：“帝国紧密运用政战两略，如中国现中央政府此际翻然悔悟诚意求和时，则开始日华直接谈判；如不来求和时，则帝国今后不以之为对手解决事变，将扶助新兴中国政权之建立，与此政权签定调整两国邦交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之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溃灭，或使其收容于新兴的中央政权之下。”[95]

在此种政策的背景下，日寇于侵占南京之次日，在北平制造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企图“逐步扩大和加强”这个傀儡政权，“使它成为”日寇所谓“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96]然而，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寇在南京又组织了一个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傀儡中央政权的先后出现，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严重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日本政府手忙脚乱费尽心机才在半年多以后勉强在两个傀儡政府之间捏合出一个所谓“联合委员会”。

占领南京是日寇战略进攻阶段初期达到的顶点，此后即向战略进攻阶段的中期和末期推移。在战略进攻阶段初期，日寇虽能依仗其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之强，又能在相当程度上利用蒋介石政府的动摇以及国际上的妥协因素，得以长驱直进，暂时处于军事上的主动地位，并于一九三七年底推进到包头至杭州一线，但日寇却不可能对中国作无限制的战略进攻。日寇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就全局而论也是对它不利的。整个中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和结局，并不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志以及政治上的政策、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为转移。

当日寇倾其全力向国民党战线进攻时，毛泽东同志已经深刻指出：“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97]日寇正是少估计了这一点，因而触到了很大的霉头。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在以山西为中心的战场上，以三师之众连战连捷，有力打击了敌寇的气焰。上海太原失守以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98]一九三八年，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已作有效地战略展开，新四军在华中敌后也开始集结展开。这种战略展开使敌寇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交通要道和某些平地，即只能占其占领区面积和人口的小半，而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却在敌占区中居其大半。根据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我军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乘敌之隙，主动、灵活、有计划地打击敌人。从而，使我在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时期中，即能逐渐树立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与敌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使敌在军事上之暂时主动地位不断向下减杀。

一九三八年，日寇在军事上仍继续其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上半年，以占领徐州打

通津浦线为作战目标，是为日寇战略进攻阶段的中期。然而，进入三八年以来，日寇战线日长，战面日宽，进攻速度和锐气都不如占领南京之前。兵力不足的矛盾也更加突出。最明显的例子是占领南京、太原两地以后出现了停顿。从战略和战役上来说，在侵华战争十个月当中，敌寇已经犯了许多错误。毛泽东同志总括地指出："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时机，包围多歼灭少，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99] 毛泽东同志继而指出："台儿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100] 日寇的财政经济也开始表现出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开始发生了厌战情绪，士气开始表现颓靡，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则更加向前发展。

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开始表现出"战争的烦闷"和对战争前途悲观的情势下，日本决策机关经过激烈的争吵，一九三八年五月近卫内阁进行了改组。由蒋介石、张群等人的旧交、更加注重诱降策略的预备役军阀宇垣一成出任外交大臣，由同宇垣关系密切、主张更多拉拢分化英美的三井财阀头面人物池田成彬出任大藏兼商工大臣。陆相文相也作了更动。

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利用蒋介石政府对日本内阁中某些人的幻想，重新施展诱降惯伎。

毛泽东同志及时洞察了日本统治集团的阴谋。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准确地指出："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份（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上层分子），狼狈为奸。"[101] 此后，毛泽东同志更一再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102] "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不会变更的。"[103]

一九三八年夏初，欧洲已是战云密布。希特勒德国在吞并奥地利之后，正准备进一步侵吞捷克斯洛伐克，此际英法对德"绥靖"政策正向新的高峰推进。在这种形势下，英国首相张伯伦更加急于在亚洲牺牲中国求得对日妥协以维护英国在华既得权益。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英国同日本达成关于中国海关的协议，竟然同意把沦陷区中国海关收入从英国汇丰银行改为存入日本正金银行，让日本控制了在沦陷区的中国海关收入。[104] 这是英国牺牲中国绥靖日本的重要例证之一。

在日本内阁改组，国际妥协因素增长的气氛中，日本新任外相宇垣一上台，就向外国记者发表一项声明，重新摆出"和平"姿态。宇垣声明说："中国方面在有根本变化时，可能考虑和平问题。"[105]

国民党政府对宇垣声明的反应是那样的灵敏，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集团都迅即出来同日寇勾搭。五月底，张群首先向敌国新任外相发出贺电，以祝贺宇垣上台为名，提出求和试探，表示汪精卫或张群本人都可以出面同日本谈判。[106] 六月二十三日，孔祥熙也密令他的秘书荪辅三去香港，同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进行接触。[107] 荪辅三代表孔祥熙向中村谄媚地表示："孔祥熙和汪精卫、何应钦都是好朋友，和各党派也亲密，至今毫无改变地是个和平主义者。不用说，蒋介石本人内心也希望和平，可是，在他的立场上不能说出口。"[108] 孔祥熙表示希望英美两国居中"斡旋"。宇垣也打算谈判到一定阶段后请第三国居中"斡旋"。所以，在日本与蒋介石政府谈判的同时，为了解决战争所引起的日本同英美两国的纠纷，又同英美两国的驻

日本大使开始谈判。[98] 六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决定："(一)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事变，大致以本年度以内达到战争目的为前提，使对内对外各种措施一切适应于此。(二)第三国友好的调停，不妨根据条件予以接受。"[99] 六月二十七日，英国外交副大臣巴特勒也在下院发表演说表示："如果中日两国同意，英国乐于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共同协力，为实现和平担任调停工作。"[100]

为进行这场对蒋介石政府的诱降活动，七月八日，日本五相会议确定了对蒋诱降的具体方针，内称："当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投降时，帝国将其作为一个政权，基于御前会议决定的方针，'使其合并于新兴中国中央政权之下'处理之。"诱降条件是四条："(一) 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府；(二) 与上述情况相配合，改变名称及改组旧国民政府；(三) 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 蒋介石下野。"并决定："如果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之投降不能肯定是事实时，不谈停战等问题。"[101] 按照这些对策，日寇同时拉住了孔祥熙、汪精卫两条线。

首先是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日本政府训令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向荐辅三提出了同陶德曼"斡旋"时大体相同的条款，再加上前述四条。七月十五日，荐辅三带着日寇条件跑回汉口。经孔祥熙与蒋介石密商之后，七月十八日，荐辅三向中村摆出了蒋介石的求和条件："(一) 中国政府努力实现对日亲善，停止一切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东洋的永久和平，为改善中日关系而积极努力；(二)'满洲国'由缔结日'满'华三国条约，间接承认；(三) 承认内蒙自治；(四) 决定华北的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可以承认在中国平等互惠地开发经济；(五) 非武装地带问题，待日本提出具体要求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六) 虽然没有充分讨论，但终究须要清算和共产党的关系。加入防共协定或缔结特别协定等，则要再加研究；(七) 关于赔款，由于中国现在非常荒废而且穷困，中国政府商议了赔款也没有支付的能力。"[102] 孔祥熙还无耻地表示："希望和平能在汉口陷落以前实现，汉口陷落以后，讨论议和就更困难了。"[103] 这个卖国方案和孔祥熙的表白，除蒋介石下野一条之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答应了日寇的各项要求，而且向日寇公然表示了反共的决心，并告诉日寇蒋介石政府准备放弃武汉。可是，日本侵略者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绝对条件。对此，孔祥熙竟向日寇哀求说："蒋主席本来抱甘愿下野态度，可是果真这样，将由谁来同日本签订和约呢？又有谁具有履行条约的能力呢？"[104] 日寇对这个哀求全不理采。孔祥熙继而又厚颜无耻地哀求说："由于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作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集全国之众望（按：这是蒋邦自己往脸上贴金），承认日本的辞职条件是困难的。可是，日本政府也有方针。时局至此，可否以行政院长孔祥熙负全责而辞职。"[105] 真是活画出一付帝国主义走狗的奴才相！

尽管蒋介石、孔祥熙表现出上述卖国丑态，可是日寇彻底灭亡中国的方针已经定了，在日寇看来，为要达到灭亡中国的方针，就必须成立完全亲日的中央傀儡政权，作为日本统治中国的工具，并驱逐蒋介石这个美英帝国主义的工具。日蒋之间的这场肮脏交易于是没有做成。

在宇垣孔祥熙之间进行秘密谈判的同时，日寇正拉住汪精卫这条线为成立其所谓"新兴中国中央政权"的阴谋进行着紧张的活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日寇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奉日本政府之命从神户出发到香港同汪派走狗高宗武密商。高一度回到汉口，同汪派大汉奸周佛海密谋之后，七月五日又鬼鬼祟祟到日本同日本陆军省、外务省、递信省官吏

商讨汪精卫投敌问题。

日寇一面施展上述诱降一手，一面纠集军事力量策划对国民党战场作新的战略进攻。

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对日寇下一步的军事侵略意图作出的判断是“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17] 当时判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至少要出动五十个师团，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用费也要达一百亿日元以上。毛泽东同志进而预断：“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18] 历史事实证明，由于我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乘敌后空虚之隙取得的普遍发展，又由于日寇失道寡助，人力、财力、物力均更感不足，占领徐州之后，已进入日寇战略进攻阶段的末期。敌寇只能以攻占武汉广州为其战略进攻在一定限度上的终点，终中日战争之局，迄未敢于深入到武汉至兰州之线。

敌在被迫从战略进攻向战略相持阶段推移的过程中，开始逐渐转为轻视国民党重视共产党。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直接控制的一个所谓“国策研究团体”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从一九三八年五月起，经约一个月的讨论，于六月，向改组后的近卫内阁提供了一个《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19] 此件中提出：“当前的战争目标”是“攻下汉口、广东[20]以及其他敌人的抗战中枢。同时，随时将沿海岸线的军事的经济的要地逐个占领，发挥海上封锁的效果。”为什么以攻占汉口为他们“当前的战争目标”呢？因为他们认为汉口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楔子”，“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份文件中还有人提出：“与其进攻汉口，不如退而采取防御的阵势。”因为这些人认为：中国进行的“是一种殖民地的解放战争”，而日本则“缺乏足以唤起国民同仇敌忾的力量”；而且，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日本“在大陆作战，通常越是深入内地，其补给线越长，陷入敌人所提倡的游击战的消耗战术的危险性也越大。”日本统治集团出于种种考虑，终于在一九三八年七月正式秘密决定在占领重要地区后改变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七月八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题为《蒋政权不投降时的对策》。[21] 其中决定：“占领重要地区后，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仍不投降时，帝国今后不用直接急于以武力解决事变，主要运用政略和策略，更加促进新中央政权的扩大和加强。同时，在政治、外交、经济、思想上，逐渐压迫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促使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毁灭。”此件中所谓“占领重要地区”是指那里呢？三个星期以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22] 作了明白招供，内称：“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东作战的时间间隔”；“以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阵势，在汉口附近，控置若干机动兵团。”其中还明白规定：“在方针上，除了汉口及广东作战以外，不进行扩大战局的作战。”这就是日本统治集团经过反复讨论和争吵之后不得不确定的战略进攻终点。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侵占广州、武汉。从此中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公开改变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据七月八日五相会议的决议，对蒋介石政府改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因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发表所谓第二次“近卫声明”。声明公开宣称改变它在同年一月十六日第一次“近卫声明”中所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表示“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23]

占领广州武汉是日寇战略进攻阶段的最后一个军事侵略高潮。此后，敌寇即不得不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而转入保守占领地，并开始转移其主力用于进攻我党领导的广大

敌后解放区。为实行这种战略转变，日本陆军省省部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制定了一个《在战略攻势和战略持久期的作战指导要纲》。《要纲》规定的作战方针是"确保占领区"；总的作战要领是："在蒙疆地方之要部、华北、华中东部地方确保现有占领地域，促进治安恢复，支援亲日政权之健实发达。""在此地区内担任警备的军队之配置尽可能固定，并且努力加浓驻兵密度，以便迅速恢复治安。"同时，《要纲》还规定了在华北、华中等方面具体的"作战指导要领"。在华北方面，《要纲》规定："专门确保占领地域安定，特别是首先争取在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和蒙疆地方之要地迅速恢复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按照需要，在占领地区内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战。"在华中方面，《要纲》规定："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之线以东占领地域之安定，特别是首先争取在上海、南京、杭州之间之地域迅速恢复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⑩ 上述《要纲》内容，从反面说明了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敌寇占领地的威胁之大。

* * *

日本帝国主义以发动芦沟桥事变为起点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从进攻平津到占领广州武汉为日寇的战略进攻阶段。在此阶段中，日本帝国主义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之以频繁的诱降活动，企图两手互相配合，利用蒋介石政府的动摇和美英绥靖主义，少兵一击，速决亡华。

蒋介石"内战内行资强虏"，在日寇进攻面前仓皇应战，适应日寇两手政策，于一年零三个半月之中，即抛弃了从芦沟桥到广州武汉的广大国土，并暗中勾结日寇进行了一连串的通敌卖国活动。正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压制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且随时准备去上日寇诱降的钓钩，才使日本侵略军得以长驱直入，使千百万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广州武汉以后由对国民党为主的策略改变为对共产党为主，被迫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而转入保守占领地。这从反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敌寇被迫改变侵华策略，不是日本侵华国策和两手政策的成功。恰恰相反，这表明，中日战争的历史发展进程违背了日本侵略者的如意算盘，无情地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速决亡华幻梦的破灭和战争初期两手政策的破产！

一九六四年五月初稿　一九七八年三月修改稿

注：①②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下同）第895页。

③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29页。

④ 《现代史资料》三铃书房1964年日文版（下同），第8卷第361页；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部分，日文版（下同），第343页。

⑤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部分，第347—348页。

⑥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313页。

⑦ 日本所谓"中国驻屯军"是日本帝国主义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据与清朝卖国政府签订的《辛丑和约》所设置，派驻于北平、天津、秦皇岛、山海关之间的铁路沿线。关于1936年日寇增兵和司令官升格材料，参看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现代评论社1975年日文版，第85页；山冈贞次郎《中国事变》原书房1975年日文版，第10—15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1972年增补改订日文版，第163页。关于增兵后日军人数，井上清前揭书说约为五千人。秦郁彦前揭书中说1936年5月后约为六千人。

⑧ 《儿玉〔谦次〕访华使节谈》，《现代史资料》第6卷第421页。

⑨ 《从九一八到七七》第48页。

⑩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35—236页。

⑪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53页。

⑫ 远东国际军事裁判速记记录第202号，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的证词。见《远东国际军事裁判速记录》日文版第5卷第136页。

⑬⑭ 《木户幸一日记》东京大学出版会日文版第575页；转引自《日中》月刊1977年7月号，日文版，第6页。

⑮ 今井武夫《中国事变的回想》三铃书房1964年日文版，第10—11页。

⑯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24页。

⑰⑱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朝日新闻社1963年日文版（下同），第4卷第7—8页。

⑲ 《河边虎四郎供述书》，远东国际裁判书证第2489号；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16页。

⑳㉒㉓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部分，第366页。

㉑ 儿岛襄《天皇》，文艺春秋刊本日文版第3卷第217页。

㉔ 《毛泽东选集》第366—367页；第414页。

㉕ 1937年7月10日《新闻报》；杨叶《芦沟桥事变》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34页；冯子超《中国抗战史》正气书局1946年版，第36—37页。

㉖ 参看冯子超《中国抗战史》第37页；廖子东《中日八年战争回顾》时事日报社1945年版第36页。

㉗㉜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卷资料篇第256页；第4卷第14页。

㉘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增补改订版，日文本，第213页。

㉙ 杨叶《芦沟桥事变》第39页。

㉚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12页的附注〈6〉。

㉛ 张自忠在七七事变后，曾一度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并在日寇侵占平津之后，代理过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但旋即逃出。后率国民党部队在台儿庄等地与日军作战，1940年5月在襄河南岸瓜店前线作战中牺牲。

㉝ 《炮轰宛平的惨象》，《港报》1937年7月31日；转见于杨叶《芦沟桥事变》第49页。

㉞ 胡华《芦沟桥事变断片》，《北京青年》第49期，1950年6月27日。

㉟ 《桥本群回想录》；转见于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08页。

㊱ 1937年7月11日，日本驻南京使馆武官大城户三治向日本政府报告称：10日，中国政府统帅部出动了空军，并有中央军四个师（按：主要为汤恩伯所部——笔者）在河南省北部省境集结（实则汤恩伯等部并未开至平津前线对日寇作战，汤部直到八月初才缓慢地经山西移动到察哈尔省境——笔者）。日寇武官报告材料见《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10页；秦郁彦《日华事变》，《日本外交史研究》（昭和时代）有斐阁版日文本第73页。

㊲㊳㊴㊵ 《日高信六郎口供书》，朝日新闻社法庭记者团编《东京裁判》，朝日新闻社刊本日文版，第4卷第121页。

㊶ 原田熊雄述《西园寺公和政局》日文版第6卷第80页。

㊷ 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第89页；《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16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356页。

㊸㊹ 《现代史资料》日文版第9卷第5页；第9卷第34页。

㊺ 《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186页；《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364页。

㊻㊼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部分第367—369页。

㊽ 《西园寺公和政局》第6卷第56—57页。

㊾㊿(51)(52)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116页；第31—32页；第32页。

(53)(54)(55) 《反对汉奸的"和平"运动》（时评），《解放》周刊第1卷第23期，第1页。

(56) 天野良和编《谨释御历代圣敕辑览》，大日本法令出版社昭和15年4月刊，第384—385页；转引自《日中》月刊，1977年7月号，第9—10页。

(57)(58) 《日中》月刊1977年7月号第10页；第17页。

(59)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部分，第370—372页。此件于十月二十四日又为日本内阁全体阁员会议所通过。

(60) 《临命第六百号指示》，《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215—216页。

(61) 参看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53年版日文本第2卷第118页；《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32—33页。

(62)(63) 《西园寺原田回忆录》第1902页；参看多萝西·包格《美国和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1968年英文版，第450—451页。

(64) 罗斯福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在美国芝加哥大桥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说，称："当传染病开始散播的时候，大家都赞成并参加把病人隔离起来以反对疾病的传播，保护公众的健康。"又说"不论宣布的或是不宣布的战争都是一种传染病。""它会把离开最初作战地方很远的国家和人民都给卷进去。"见《和平和战争——美国的外交政策(1931—1941)》美国政府出

版局华盛顿1943年版英文本，第384—387页。

㊽ 英国想把日本的对立目光引向美国，从而，建议九国公约签约国会议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美国立即予以拒绝。罗斯福转而提出"比京布鲁赛尔为适当开会地点。"参看《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度第4卷英文本第68页。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想要了解罗斯福隔离演说的"确切解释"以及美国在布鲁赛尔会议上将采取的对日政策，美国驻伦敦大使拜会艾登表示："总统以为，那种在诸如到底要走多远以及总统芝加哥演说的确切含义这些问题上，想把美国套进一项明确的声明中去的企图，是讨厌的和有害的。"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度第4卷第92页。

㊾ 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年)，英国政府政务局伦敦1949年英文版（下同），第4集第1卷，第770页。笔者凡引用本书文电，基本上采用施子愉同志在《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上发表的译文，惟出处则注英文本原书，以供阅者查核方便。

㊿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352页。

(51)(5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年)第4集第1卷，第778—779页。

(53)(54)(55)(56)(57)(5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年)第4集第1卷第821页；第791页；第780页；第780—781页；第784页；第787页。

(59)(60) 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度第4卷英文本第150—152页；第191页，(文内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61) 《大陆命第八号》，《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216页。

(62)(63) 见汪精卫投敌后的《第三次声明》(1939年3月28日)；《声明》全文见《日本陆海军省档案》Reel 第112号（显微胶卷)。

(64)(65)(66)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11—412页；422——423；424页。

(67)(68)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5日，转引自《日中》月刊1977年10月号日文本第13页。

(69) 北望社刊《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诏敕集》，转引自《日中》月刊1977年7月号第13页。

(70) 《致在京德国大使关于日中和平交涉的复文》，见前揭《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部分，第380—381页。

(7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1931—1941)》第1卷英文本第434—435页

(72) 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回忆录中曾明白供称："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以便于适当时机到来时，我们有再一次如同西奥多·罗斯福一九〇四年出面结束日俄战争时的那种同样的机会。"见《赫尔回忆录》纽约1948年英文版第1卷第554页。

(73)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66—567页。

(74)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卷资料篇，第274页。

(75)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部分，第386—387页。

(76) 参看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第95—96页。

(77)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57号（显微胶卷)。

(78)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1937年12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部分，第381页。

(79)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74页。

(80)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58页。

(81)(82)(83)《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73页；第423页。

(84)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选集》第536页。

(85)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46页。

(86)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163页。

(87)(88)(89)(90)(91)(92) 《在香港的中村总领事和孔祥熙的代表养辅三之间关于日中和平交涉的会谈》，日本外务省档案S 487号(显微胶卷)。

(93)(94) 宇垣一成《宇垣日记》朝日新闻社1956年日文版，第327页；第330页。

(95)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53年日文版第2卷，第130页。

(96) 《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部分，第389页。

(97)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第130页。

(98) 《蒋政权投降时的对策》，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57号；S491号(显微胶卷)

(99)(100)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31页。

(101) 木户日记研究会编《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日文版第324—329页。

(102) 从此件以下，所引日本方面有关文件中，凡"广东"字样均系指广州——笔者。

(103)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57号(显微胶卷)。

(104)(105) 《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269页，第555—559页。

(106)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部分，第401页。